

# 马克思恩格斯小农经济理论新发现 及现实意义

丁长发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小农经济,提出了完整的小农经济理论。其中包括小农的特征:既有保守性、分散性、依附性等传统特性,更具有顽强性和经济理性;小农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是革命的同盟军,而且是革命和经济建设的主体;小农未来发展的路径不是消亡,而是应该提高小农的素质、用科技武装农业和农民、以工业反哺农业和以城市支持农村。作为典型小农经济国家,我国应该走提高小农素质、科技武装小农和农业以及根据小农经济的特性反哺农业和农村的“普照之光”的道路。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小农经济;新发现;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以 19 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农业为研究对象,区分了小农与小农经济的概念:小农经济是指一种经济形态,而小农是指这种形态中的主体。马克思把小农经济视为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方式,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科学界定的小农内涵为国际农业经济学界广为接受,如《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福斯特(R.Forster)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sup>[1]</sup>。

我国许多学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2011B218)。

[作者简介]丁长发(1969-)男,福建顺昌人,经济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农业经济体制、土地问题。

中涉及小农的性质和特征、小农在革命时期的作用,认为小农和小农经济必然消亡等。但是笔者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发现,他们不仅分析了小农的传统特性,也分析了小农的顽强性和经济理性;小农不仅在革命时期具有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具有主体性作用;小农和小农经济的消亡路径是具有条件性的,应该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走提高小农的素质、用科技武装农业和农民,根据小农经济的特性实现反哺农业和农村的“普照之光”的道路,从而缓解我国“三农”问题,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服务。

## 一、对小农性质特征的新认识及现实意义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小农经济的阐述,既

有对小农的保守性、分散性、依附性等传统特性的分析,也有对小农顽强性和经济理性的分析。

### (一)小农具有顽强性

小农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顽强性,不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高,而是由于“他们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生产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一般价值的形成”<sup>[2]</sup>。“生产的很大部分都是为满足本身的需要,和一般利润率的调节作用无关”<sup>[2]</sup>,即小农的生产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因此他们的经营界限不受绝对地租、平均利润、生产价格乃至市场价格的制约,具有较大的生产弹性。

### (二)小农具有经济理性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3]</sup>。而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是: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公有的财富,而是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sup>[4]</sup>。经典作家也认识到小农的经济理性,强调现实中的农民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sup>[5]</sup>。毛泽东是党内较早认识到农民具有经济理性的党内领导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指出:“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原因,是不对的”<sup>[6]</sup>。他强调抗日根据地必须尊重和重视农民的利益才能生存和发展,即“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sup>[7]</sup>。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sup>[8]</sup>。其实,从建党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我党大部分土地纲领都是在建立耕者有其田的产权制度。如1925年的《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1931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布告》、1940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农村产权制度、1947年的《中国土地

法大纲》、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提出并进一步推进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建立。建立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产权制度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毛泽东始终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sup>[9]</sup>。

正因为农民经济理性,小农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如果违反小农的意愿,就会受到惩罚。如人民公社超越了小农的意愿,到1978年全国农村尚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占农业人口总数的30%以上),全国乡村人口每人平均消费粮食199公斤、食用植物油1.1公斤,分别比1957年的205公斤和1.9公斤还减少了3%和42%;从1953年到1978年,农民年均货币收入增长仅1.55元<sup>[10]</sup>。对此,邓小平十分痛心:“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sup>[11]</sup>。

邓小平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指出农民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最高领导人,他实事求是地把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发明权归功于农民,改变了多年以来形成的认为农民就是落后、封闭、分散和保守的思维定式,凸显了当代中国农民富有创造精神的形象。邓小平还指出农民具有自身的利益取向,他说:“如果不能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会不安定”<sup>[11]</sup>。此后,我党的历次一号文件都指出要充分尊重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在实践上,为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我国于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实现了村民自治和农村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逐步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低保、农村养老体制以及对农业的“四项补贴”等,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赋予农民土地长久使用权,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

高个人收益”；2016年党的一号文件提出要贯彻落实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因此，在共和国经济史上，凡是我党的政策认识到小农的经济理性，照顾到农民利益的时

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5.9%。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亿吨，增产34%；1984年，棉花总产量为625.8万吨，增长了2.28倍，油料增长了2.01倍，猪牛羊肉增长了1.6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接近3倍（见表1）。

表1 我国不同时期的主要作物产量和人均量 单位：万吨、公斤

品种	粮食 (总量和人均)	棉花 (总量和人均)	油料 (总量和人均)	糖类 (总量和人均)	农民收入 (元)
1949年	11318 208.9	44.4 0.8	256.4 4.7	283.3 5.2	43.8
1952年	16391.5 288.1	130.4 2.3	419.3 7.4	759.5 13.4	57
增长的倍数	1.45 1.38	2.94 2.88	1.64 1.57	2.68 2.58	1.3
1957年	19504.5 306.0	164.0 2.6	419.6 6.6	1189.3 5.7	73
1962年	15441.0 231.9	75.0 1.1	200.3 3	378.2 5.7	99.1
1978年	30476.5 318.7	216.7 2.3	521.8 5.5	2381.9 24.9	133.6
增长的倍数	1.56 1.04	1.32 0.88	1.24 0.83	2.0 4.37	1.83
1978年	30476.5 318.7	216.7 2.3	521.8 5.5	2381.9 24.9	133.6
1984年	40731 392.8	625.8 6.0	1191.0 11.5	4780.3 46.1	355.3
增长的倍数	1.34 1.23	2.89 2.61	2.28 2.09	2.01 1.85	2.66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农业统计资料》计算得出

期，我们的经济社会都发展的比较好。如1949年到1953年，我国初步建立了耕者有其田的产权制度。1952年与1949年相比，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年平均递增13.14%；棉花总产量由44.4万吨增加到130.4万吨，年平均递增64.56%；油料由256.4万吨增加到419.3万吨，年平均递增21.17%（见表1）。195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30.1%，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28.5%；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为12.3%，复种指数由1949年的127%增加到1952年的131%，1952年的灾害抗逆指数达到0.735，人均粮食的占有量提高了37.9%<sup>[10]</sup>。

1978-1984年间，我国实行了农地家庭承包制，农业产出的年均增幅高达11.1%，其中种植业

二、小农主体性作用的新认识：小农不仅是革命的同盟军更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小农既有革命性又有保守性，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农民是无产阶级忠实的同盟军，是强大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不和这个力量强大的农民结成联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sup>[12]</sup>。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小农在革命中的作用中国化，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

命队伍的主力军”<sup>[13]</sup>。因此,如果忘记农民,“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sup>[14]</sup>。毛泽东详细分析农民的具体作用: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sup>[9]</sup>。毛泽东的这些论断超越了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是革命后备军的思想。

邓小平深刻指出农民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政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全面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比如1980年广西的宜山和罗城两个县的村民自治,乡镇企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是村民发明和选择的。农民还是我国政治稳定的主体,“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sup>[11]</sup>。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sup>[11]</sup>。因此,“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sup>[15]</sup>。从此,农民的主体新作用都贯穿于党的文献。

### 三、小农经济的新发现及现实意义

马克思基于19世纪各国的客观实践,分析了小农和小农经济消亡的制度环境: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对小农的盘剥,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农村家庭工业因大工业的发展而被消灭,小农的土地逐渐贫瘠和地力枯竭;农产品价格下降,生产工具简陋、有限导致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下等<sup>[2]</sup>。得出了小农会被资本主义雇佣大农取代,变为雇佣工人,同时小农经济会被工厂化大农场取代的结论。但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是因时间、条件和地点的不同而转移的。

(一)现代国家都建立了对小农经济(小规模家庭农业)的财税支农政策

一方面,随着各国工业化发展,“在欧洲,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

素”<sup>[4]</sup>。这是农民组成了自己的协会,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是“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总是同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sup>[16]</sup>,存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发达国家都开始遵循马克思的“国家要慷慨地对待农民”<sup>[4]</sup>,实现“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sup>[17]</sup>。如马克思当时研究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还有大量的财税补贴和优惠政策。如按农民人均计算的话,21世纪初每个农民享受到的农业补贴为:美国1.4万美元,欧盟1.7万美元,日本2.3万美元<sup>[18]</sup>。2005年,OECD平均每公顷耕地得到923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632美元/公顷,欧盟为1815美元/公顷,日本为13555美元/公顷<sup>[19]</sup>。因此,欧美国家小农业生产条件没有日益恶化,反而得到极大改善。我国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实施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了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小麦和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等50项农业和农村补贴政策,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小农经营的制度环境。

(二)现代国家建立了庞大的金融(保险)支农体系

如美国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它包括12家联邦土地银行及地方联邦土地银行(向农场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12家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向农场提供中、短期贷款)、12家生产信贷公司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地方生产协会(向农场提供生产贷款)以及13家合作社银行(向合作社提供贷款)以及农业部农产品信贷公司(CCC)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世界上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德国的信用合作社(又被称为“人民的银行”)金融支农,英国的合作银行、信托储蓄银行(TSB),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和大众银行集团以及互助信贷全国联盟和合作信用中央局等金融支农体系。这使得小农家庭农场非常容易获得信贷。我国也在1994年建立了服务“三农”的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

2005年通过法律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村保险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选择部分地区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开展了农地抵押贷款、农产品保险制度等金融保险支农政策,有力地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 (三)小块土地没有逐渐贫瘠和地力枯竭

一方面,科技的进步破除了土地面积的制约,促进了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并防止了土地质量的恶化。如“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sup>[3]</sup>。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不管农民获得土地是“美国式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都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sup>[20]</sup>。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会激发他们对土地的热情和投资的积极性,促进土壤质量的改善。并且“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sup>[2]</sup>。总之,土地得到合理激励以及随着科技在土壤应用的推进,可以有效促进农地质量的提高。我国土地承包权从15年延长到30年再到永久使用权,以及促进农业科技进步都是为了促进农地质量的改善。

### (四)农业的规模效益问题

经典作家分析了农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农业人口的自由迁徙与全面流动。恩格斯说,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sup>[21]</sup>。农村劳动力在追求高工资的理性预期下,其自由迁徙和流动为农业的规模经营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这是实现农业规模效益的前提。马克思还分析了土地的自由交易和集中以及资本进出农业自由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农业的公共产品性质和农民的斗争等因素,现代国家对农地交易和资本进入农业都进行了严格的用途管制。因为“农业不能像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农业必然服从“有机界的规律”<sup>[2]</sup>。这是农业中的种植业至今没有出现工厂化大农场的原由。

一方面,实践效果欠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

应王震的建议在新疆和黑龙江搞建设兵团开始,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实际上都是大规模经营,走机械化道路。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监督成本、激励机制等问题,其实际效果不好。前苏联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也恶果累累,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sup>[22]</sup>。因此,毛泽东很注重这一历史教训,“苏联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么?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sup>[23]</sup>。另一方面,基本国情资源刚性约束下,为提高土地单位产出,毛泽东指出:“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sup>[24]</sup>,并指出中国就是要靠精耕细作吃饭,争取将来变成世界第一高产的国家。邓小平指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sup>[25]</sup>。因此,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农业要因因地制宜,“尊重科学,同样一块土地,收入就会增加3倍甚至4倍”<sup>[26]</sup>。正是因为我党坚持了小规模家庭经营,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用占世界9.8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

并且,随着农业实践的发展,小规模家庭农场还具有社会效益,即多功能性。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还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即小规模家庭农业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功能,其社会效益突出。

在农地资源高度紧张的我国,如何实现小农经济的规模效益呢?1998年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农村工作时做了最系统的阐述:“从实践上看,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sup>[27]</sup>。即通过家庭经营加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的外部规模效益。这已为农业现代化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农地资源禀赋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所证实。

### 四、小农经济现代化新路径及现实意义

针对我国农地资源禀赋即人多地少的农业现状。邓小平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

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sup>[11]</sup>既不是消灭小农,也不是走农地国有集体规模经营的道路,而是走提高农民、用科技武装农业和农民、反哺农民和农业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

### (一)提高农民的素质

为了更好地实现小农经济的现代化,马克思认为应该“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sup>[4]</sup>。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sup>[9]</sup>。这都表明了只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真正实现农民的主体地位,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邓小平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是实施“科技兴农”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sup>[26]</sup>。必须坚持“在农村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学龄儿童上小学,不许中途退学,成年农民入冬学”<sup>[27]</sup>。2006年我国实现了农村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2013年11月3日至5日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指出:要切实办好农村义务教育,让农村下一代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sup>[28]</sup>。并在2013年12月23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因此,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健全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将全日制农业中等职业教育纳入国家资助政策范围,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二)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用科学技术武装农民来促进农业现代化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sup>[3]</sup>,毛泽东结合中国小农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明确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

无法提高”<sup>[23]</sup>。邓小平认为农业科技现代化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核心,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作用是无穷无尽的”<sup>[11]</sup>。邓小平注重运用科学技术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他认为促使农业大幅提高的最实际、最经济的办法是改善投入的质量,广泛利用知识进步和现代技术。农业科技进步是打破由缺乏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制约的必要条件,一个社会可以利用的农业技术变革途径有多种,因土地供给缺乏弹性给农业发展带来的限制可以由生物技术的发展而抵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使得科技对农业的贡献大大提高。到2014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5.6%,粮食亩产提高到359公斤,品种对提高单产的贡献率达到43%<sup>[29]</sup>。

### (三)以城市支持农村,以工业反哺农业

恩格斯指出在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需要“慷慨地对待农民”<sup>[4]</sup>。如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金融支持以及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肥料等及其他各种便利支持<sup>[4]</sup>。马克思认为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来支持农业,如“铁路的敷设、水利设施的建设”<sup>[30]</sup>。并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具体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制度安排;自2006年我国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民年均减负超过1000多亿,2006年开始实施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2002年开始初步建立了我国农民低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并首次建立了新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随后党中央国务院的财政支农力度大幅度加强。

### 五、结束语

毫无疑问,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农村改革的行动指南。在对待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上,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我们既要看到小农的落后、分散、依附等传统性,也要看到小农的顽强性和经济理

性;小农不仅是革命的同盟军,而且是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小农和小农经济未来发展具有一系列制度条件,马克思主义真理是随着时间、条件和地点的转移而发展变化的。随着小农经济所面临的财税、金融支持体系的变化、农业科技的进步、农民协会对自身利益的斗争等使得小农不会消亡,种植业不可能出现工厂化大农场;小农经济现代化的路径是提高农民的素质、用科技武装农民和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普遍性的路径安排。

马克思小农经济改造的思路为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改造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很多宝贵策略。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如何减少农民、缓解我国的“三农问题”,实现小农经济的现代化,需要在坚持和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按照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成就基础上建立起服务我国小农经济的“普照之光”,例如:建立健全服务我国农民的农村金融(保险)体系、农业财税支持体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允许小农自由迁徙和流动;逐渐提高我国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建立各种各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保护农民利益和降低农民和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等是实现我国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参考文献

- [1]皮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882.
-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 [5]列宁全集(第3版第4卷)[M].中央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9.
- [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人民出版社,1982:169.
-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3:467.
-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252.
-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 [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M].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出版社,2009.
-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 [1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
- [1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第2卷)[C].人民出版社,1991.
- [1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15]江泽民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6.
- [1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
-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 [18]柯炳生.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农业支持政策改革[EBOL].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chinareform.org.cn/20030120meeting/zhuban.htm.
- [19]李先德.OECD国家农业支持和政策改革 世界银行“中国农业政策实验室”项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R].研究简报,2006(11).
-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58.
-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
-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A].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 [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A].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27]中央文献出版社.《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A],2002.
- [28]习近平在湖南考察 要精准扶贫 切忌喊口号[N].人民日报,2015-06-25.
- [29]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5.6%[N].人民日报,2015-01-04.
-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李亚利)